

亩”。天启二年(1602年),太仆卿兼河南道御史董应举“兼理天津山海关等处屯田”,在海河两岸“用公帑六千,买民田十二万亩,合闲田十八万亩,广募耕者”。明崇祯十二年(1639年)李继贞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,巡抚天津,督蓟辽军饷,乃大兴屯田,“白塘、葛沽数十里间田大熟。”明代对天津农业贡献最大的,是大科学家徐光启。他早年曾从利玛窦学西方“有用之实学”。明万历四十一年(1613年)称病寓居天津,潜心探究农业,在天津买下荒地,从上海召人耕种,同时在住处附近亲自试种,对灌溉、种子、肥料等逐项进行试验,还写下了《农政全书》一书。

清代屯田有成效者,先是康熙时的天津总兵蓝理和雍正时的水利主持者陈仪。蓝理于清康熙十二年(1673年)任天津总兵,认为“直隶沿海旷地,丰润、宝坻、天津等处洼地,可仿南方开为水田栽稻”,提出招募江南等处无业之民安插天津,给予牛、种,将沿海弃地尽行开垦一万余亩。垦田的地点在天津城南,《燕下乡脞录》载:“天津城南五里,有水田二百余顷,号曰蓝田,因田为康熙间总兵蓝理所开浚也。河渠圩岸周数十里,蓝尝召闽浙农人督课其间,土人称为小江南。”但蓝理调离后,无人管理,“圩坍河淤,数载废为荒壤”。清雍正三年(1725年)畿辅大水,朝廷遣人浚治,奏设水利营田府,置营田观察使,分京东、京南、京西、天津四局。其中“天津局统辖天津、静海、沧州暨兴国、富国二场,自苑口以东凡可营田者咸悉隶焉”。由陈仪于雍正五年(1727年)领天津局事。时垦田在贺家口、何家圈至东、西泥沽、葛沽一带,有四百五十余顷,仿照汪应蛟的办法,亦称“营田十围”。

清代最后一个在天津进行大规模屯垦的,是淮军首领周盛传,以小站为中心,垦田达1138顷,并开凿了马厂减河、月牙河、双桥河、卫津河等水利工程,至今仍得其利,但这已是晚清的事。记录当时水利工程建设《双桥碑》《新开卫津河碑》《沟洫碑》等皆尚存。

第八节 教育和文化

适应政治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需要,明代于正统元年(1436年)建立封建儒学的主要传播阵地卫学。“天津三卫前未有学,正统纪元,圣

天子嗣位之初，以武臣子弟，皆将继其祖父之职业以效用于时，不可不素养而预教之，乃命天下凡武卫悉建武学而立之师，选武官与军士子弟之俊秀者充弟子员，于是天津及左右卫始有学。”学舍初由天津左卫指挥金事朱胜“捐舍基建之”，“首建斋堂公廡，（成化）十二年大成殿落成”，随后又陆续建成两庑文昌祠、启圣、名宦乡贤祠等。清代天津改府，附廓设县，卫学改为府学。雍正十二年（1734年）在府学之西又建县学，并建学宫，即今府庙、县庙，是天津最大的古建筑群，占地 12107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3243 平方米。卫学和县学招收名额有限，于是又出现私人创办的书院，著名的有三取书院、问津书院、辅仁书院。三取书院由进士王又朴于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年）发起创建，在三岔口南赵公祠内，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由商人捐资建舍 20 间。问津书院利用盐商查为义捐废宅基，于乾隆十二年（1747年）由盐运使卢见曾请准，用银 2400 两创建，有屋 59 间。辅仁书院创建人为进士王天锡、举人梅成栋，地点在文昌宫旁。此外还有为贫家子弟设立的义学，约有十余处。

明清天津文化有一个特殊的亮点，便是名园迭出，文人荟萃，文坛活跃。在盐、商经济发展中滋生的巨富，竞相构筑巨宅豪园，尽情挥霍享受。“盐筴长芦比要津，风天气色属商人。铜山金穴须臾事，大宅连云递旧新。”较著名的如大盐商张霖的问津园（三岔河口以东）和一亩园（城外东北隅），张霖从弟张霖的帆斋（三岔河口旁），妻弟梁洪的七十二沽草堂（锅店街南运河右岸），佟铨的浣花村（在城西三星南运河左岸），数不胜数。其中尤以城西 3 公里的水西庄著名，由芦盐巨商查日乾始建于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。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，复建园中之园“小水西”。乾隆二十三年（1758年）又辟建介园，乾隆帝多次驻蹕，并更名芥园。园“近水又近郭，宜骑复宜船”，“因高而借远”，“遐想而借虚”，地广百亩，构思巧妙，园中之园多至十余处，时与扬州小玲珑山庄、杭州小山堂齐名。清嘉庆时崔旭的《津门百咏》，其中有咏水西庄的诗句：“芥园高傍卫河旁，楼阁参差映绿杨。曾是当年诗画地，行人犹说水西庄。”今虽已繁荣不再，诗人仍寄以怀念。

有的盐商为附庸风雅，或本身能诗善画，故凭借经济优势，经常延

揽四方名人学士,馆于园,结社吟诗,著书作画。天津交通便利,加上园林秀美,条件优越,便成为文人学士展示才华和抒情遣兴的理想场所。大批文人到天津作客,有的还落户天津,原籍武进的朱岷便是其中之一。大盐商张霖的问津园,张霖之孙张映辰的园林思源庄,大盐商查为礼的名园水西庄,以及大盐商李承鸿的园林半舫轩、听月楼枣香书屋,皆是文人学士麋集之所。著名文人朱彝尊、姜宸英、方苞、朱岷、吴廷华、汪沆等,都是这些园林的座上客。有的还受聘参与天津文化建设活动并作出贡献,如汪沆曾参与《天津府志》的编修,吴廷华参与《天津县志》的编修。在活跃的文化氛围中,天津自身也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人才和作品,在经、文、书、画等诸方面皆有成就,较具代表性的有王又朴、查为仁、佟蔗村、华长卿、梅成栋等。王又朴著《易翼述信》,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,另有《诗礼堂全集》《诗礼堂古文》《诗礼堂杂纂》《河东盐法志》等著作。查为仁的《绝妙好词笺》亦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,另有《莲坡诗话》《蔗塘未定稿》等著作。华长卿除诗作外,对经、史、考据亦功力深厚。此外张霫、梅成栋的诗,金世熊、乔耿甫的书法,朱岷、金玉冈等的画,都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。

天津主要在漕运推动下发展,“舟楫之所式临,商贾之所萃集,五方之民所杂处”,由滨海弃壤,逐步成为一座水陆码头、商业城市,多种不同系统、流派的宗教也随之发展起来,并且折射出城市发展的特色。元时仅知有天妃宫(三岔河口)、灵慈宫(大直沽)、海会寺、三皇庙等有限几处,明代增至五十多处,除传统的佛寺(如大佛寺、大悲院、观音庵)、道观(如太虚观、真武庙、九天庙)外,还有大量因天灾、疾病或缘于某项生产活动产生的庙宇,如由漕运产生天妃宫,仓廩产生镇仓关王庙,海运和海难产生海神庙,虫害产生虫王庙,养马产生马神庙等。伊斯兰教清真寺据传出现也较早,金家窑清真寺始建于明万历二年(1574年),小伙巷清真寺建于清顺治元年(1644年),天穆清真寺据传始建于明永乐年间。清顺治十三年(1656年)荷兰使节到天津,称“这个地方到处为庙宇点缀”。许多寺庙香火历久不衰,建筑亦保存至今,成为重要古文化遗存。卫城东北角的天妃(后)宫,占地面积 5350 平方米,建筑面